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312_20(2).0001

柳詒徵崇古思想探論

An Investigation of Liu Yizheng's Idea of “Revering the Ancient”

余一泓*

Yi-hong YU

關鍵詞：柳詒徵、《周官》、近代舊學、清季新學

Keywords: Liu Yizheng, *Rites of Zhou*,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in Modern China,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Period

2022年11月14日收稿，2023年5月2日修訂完成，2023年10月11日通過刊登。

*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博士後研究員

Postdoc researcher, Ma Yifu Academy at Zhejiang University

摘要

基於近代學人柳詒徵的著作，此文對他的崇古思想做了考察，以期呈現舊學隨順新潮的典型個案。首先，此文研究了柳詒徵在清季的成學背景和習作，指出柳氏抄錄、編纂的治學方式受其參與新政經驗的影響，而在形式之外，新政學務中的崇古、孔教與中體西用精神也塑造了柳氏學思的內容。其次，此文研究了柳詒徵在民初到抗戰時期的著作與言論，描述柳氏崇古宗周的學思此時如何定型，並且他也表現出了據古之政教典型響應世變的意圖。再次，此文研究了柳氏在三四十年代的言論與著作，指出柳氏在內外緊張的時局之下，如何對政教合一的古代理想做出各種應時色彩的闡釋。最後，此文簡要評論了柳氏崇古學思的困境。

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modern scholar Liu Yizheng's idea of "revering the ancient" evidenced in his writings, in order to render a typical case of traditional scholar struggling in modernization trend.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studied, Liu's background and work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points out that his academic methods are influenced by his experi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New Deal, and in the meanwhile, the spirit of revering the ancients, Confucianism and traditional ethics also shapes Liu's thought. Secondly, this paper studied Liu's books and essays during the early t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describe how his idea of "revering the ancient" becomes shaped at this time, while he also showed his intention of respond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political ideal in ancient China. Thirdly, this paper studied Liu's speeches and works in 1930s and 40s, and pointed out how his ideal of the unity of politics and education is elucidated in different pragmatic approaches under the ten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d the historical dilemma of Liu's idea of "revering the ancient".

壹、引言

在現代學術史上，丹徒柳詒徵（1880-1956）以精深之史學和保守的姿態馳名士林。¹然在今視之，信古、崇古、宗經為旨趣的柳氏史學，價值不易衡定。與柳氏史學意義之模糊對應的，是他不無造作嫌疑的保守形象。這種形象在今人觀察北大南高的新舊之爭時顯得尤為分明。²有鑑於此，已有研究柳氏思想者使用經史舊學的角度取代了有削足適履之嫌的史學，成效斐然。³雖然如此，基於結集整理之文獻深入柳氏學思，猶有新義可發。

約言之，柳氏之學乃是觀察清季新學在民國時期迴響的絕佳樣本。已有學者指出，他在新舊之爭時期的〈漢官議史〉、《中國文化史》與戊戌時期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以中學言西政的文字同功。⁴柳詒徵認為人類政教的一個典範可以在《周官》經中找到，而這一典範在中國歷史中的演生與蛻化，對於秩序紊亂、道德淪喪的近代中國來說意義

1 柳氏 1943 年榮膺教育部第二批次部聘教授，得票位列史學學門第一（首批的「第一」為陳寅恪），薦舉人包括繆鳳林、錢穆等保守派學人。參曹天忠：〈檔案中所見的部聘教授〉，《學術研究》，2007 年第 1 期，頁 114-115。

2 尤小立含蓄指出在今人眼中，柳氏史學其實難免胡適「過於信古」的批判（〈重讀《評柳詒徵著〈中國文化史〉》〉，《讀書》，2017 年第 8 期，頁 133-140）。李孝遷則單刀直入，認為學界忽略了柳詒徵舊學宗主的形象實乃其人和後學刻意營造而成。柳氏陳舊的價值觀念和晦澀的經史理想，使得其史學游離於東學之新和國學之舊，終無體統。柳氏部聘教授的榮譽不因其史學而來，更多是因保守儒宗的地位而來（〈印象與真相：柳詒徵史學新論〉，《史林》，2017 年第 4 期，頁 120-135）。此論尖銳。劉龍心在其專論中就看到了柳氏史學代表作《中國文化史》有疑古思想的痕跡，但其整體立論的史學史意義又不算突出（《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 年），頁 27-28）。有關柳氏的守舊形象如何在寫作《文化史》和《學衡》諸篇論文的時期演成，可參劉博滔：《「舊瓶」裝「新酒」——柳詒徵文化史書寫之兩歧》（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碩士論文，2019 年），頁 30-54。有必要解釋的是，說柳氏史學著述的學術史意義有限，史學的知識性格模糊不夠實證，絕不是說他史學「不行」。柳氏的圖書館工作，對文獻的考辨，形成了厚重的學術遺產。他的文獻學功力當時就有口碑，例如章太炎在 1924 年潛心寫作《清建國別記》時，就提到明末歷史文獻繁雜難辨，南方惟柳詒徵最適合整理。參〈與吳承仕書〉，《章太炎全集·書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426。

3 沈政威：《國史要義與柳詒徵春秋經史學》（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1 年）。前揭李孝遷與劉博滔文皆有見於柳詒徵的經史背景，然未予申述。鑒於沈、劉之學位論文對於柳詒徵專著中的許多文本都有分析，本文將儘量避免重複勞作。

4 茅海建：〈論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期間的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中國文化》，2017 年第 2 期，頁 211。

重大。經由這一路徑，柳氏回應了清季之孔教與新學，民初勃興之新文化，以及由三民主義所影響的共和理念。中國在現代化潮流中位居邊緣，但卻有深厚的文化積累，論者分析《周禮政要》時有言，儒者面對新潮時以中言西的比附，是不對稱的文化交涉（*asymmetrical exchange*），也是非現代陡然遭遇現代之所必有。⁵在清季之「新說」到抗戰前後的「舊論」當中，柳氏學思折射出了地方（*provincial*）與世界（*universal*）文化的緊張和暫時性和解。在現代化遠未畢其功於全球的今天，類似的妥協仍在發生。

要之，以崇古方式與新潮相處，反映了相當一部分文化人由舊而新的深刻選擇，更是後人面對世變的寶貴資鑒。這也就是為什麼柳詒徵晚年自述道：「後來子弟，盡有天資穎敏，殫精科學，蜚聲世界，突過前賢者。但其由舊而新，決不能如我一生遭際，此為我所敢斷言。」⁶在仍有部分關鍵性文獻未能披露的條件下，⁷《柳詒徵文集》等文獻的出版，已經為研究柳氏學思及其背景提供了足夠的便利。由「崇古」線索閱讀柳氏獨特的一生遭際，推進既有研究，確實可能。以下先從弱冠之年，親歷新政的柳詒徵開始說起。

貳、新學、舊史和舊教

一、從編譯工作接觸新學

得益于自述文獻，柳詒徵早年生活與學問的情況大體易知。就內史而言，柳氏自稱他對經術和理學來自于父家，尤其是族祖柳興恩。另一方面，

5 Rudolf G. Wagner, "A Classic Paving the Way to Modernity: *The Ritual of Zhou*", in Sarah C. Humphreys and Rudolf G. Wagner edit., *Modernity's Classics*, (Berlin-Heidelberg: Springer, 2013), pp. 77-99.

6 柳詒徵：〈我的自述〉，收入楊共樂、張昭軍主編：《柳詒徵文集》（下文省稱《柳集》），略去作者、編者名姓）第1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431。

7 例如記事詳贍的日記就尚未公佈，只能從柳氏家人的引述中窺見只鱗片爪（柳佳：《柳詒徵書法研究——以未刊《幼堂日記》等為中心》，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碩士論文，2016年）。鑒於本文未能掌握這部關鍵文獻，所以無法做到更嚴格、精密的歷時性考察。

外祖和母親又為父親早逝的柳詒徵提供了堅實的德、智培育。⁸論者點出：十七歲考上秀才成為士人，二十歲進入江楚編譯局接觸新學，纔是柳氏學問人生的轉折點。⁹在此期經歷當中，柳氏父親的老學生陳慶年（1862-1929），乃是一位重要人物。

出身南菁，受教黃以周（1828-1899）、王先謙（1842-1917）的陳慶年，也跟清流魁首張之洞（1837-1909）有密切的來往。陳氏學主經世、熱心新學，同時亦不失上述諸人維護名教的穩健氣質。¹⁰他不僅勸勉柳氏棄時文而治史學，還引介他進入新政建制江楚編譯局、接觸新學。或曰柳詒徵在陳氏引導下成為了「洋務派知識分子」¹¹，主要是就後一層面而言。也有論者看到，「通經史之教」是陳慶年對柳詒徵學思的主要影響。¹²確實，後來對柳詒徵建立了長期關係的文史大家繆荃孫，本身也是陳慶年的前輩。¹³如具體到細節，陳慶年本身以博覽、抄錄、節選為特質的學風，可裨學者收攝龐雜多端的知識以資實踐。這種取向，在柳氏此後的編譯事務中數有展現。

14

進入編譯局不久後，柳氏的第一本著述《歷代史略》成稿了。但是在抄錄補輯那珂通世之書以外，此書並無太多個人發明。一九〇三年一月，柳詒徵隨繆荃孫踏上了赴日考察學務的旅程，並在約兩月後返回。¹⁵按柳氏乃此行唯一一位在譯書局專纂修工作者。¹⁶據其自述，在張之洞向繆荃孫

8 〈我的自述〉，《柳集》第11冊，頁421-423。

9 孫文閣：《柳詒徵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頁19。

10 參趙統：《南菁書院志》（上海：上海書店，2015年），頁386-392。

11 這是孫文閣與早期研究者張文建共有的看法，參孫文閣：《柳詒徵史學研究》，頁14。

12 沈政威：《國史要義與柳詒徵春秋經史學》，頁23-24。

13 沈政威：《國史要義與柳詒徵春秋經史學》，頁23-24。

14 陳慶年：〈上張廣雅尚書〉，收入許進、徐蘇編：《陳慶年文集》，頁226：「竊謂治史之要，莫要於節。古人作史從此入手，故司馬遷網羅舊聞而為要刪，以示成學。後儒讀史亦從此入手。故劉知幾歷詆諸家，而擬點煩以省周覽。前人非此不能述作、今人非此不便誦習。……刊繁文以守約，掃群碎以治要，程限易赴而後史學始立。」

15 對1903年旅日問題的時間辨析，參孫文閣：《柳詒徵史學研究》，頁16-18。

16 繆荃孫等：《日游彙編 日游筆記 東瀛小識》（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頁22。

一行索要考察報告時，全隊也僅有柳詒徵一人能出示日記以為彙報書。¹⁷檢點柳氏之記錄，有如下記載特別值得注意：

設為農工商者不知道德，于實業亦難進步。如貴國工商素稱繁盛，然至今日未能發達者，由治實業者初未受普通教育也。人之患莫甚於自私自利之見。此患各國人皆有之。敝國諸教員為教科書受賄事，亦坐此弊。故敝國近來諸教育家，極注意於德育……，考究歷史，可以分別人種，學者知我國人種與他種不同，即可因以生愛國之心。貴國歷史與敝國不同。敝國皇統綿綿，歷千萬祀而不易。貴國一朝有一朝之史，古今若不相屬。然總之須養成一種愛國心。讀貴國之歷史，可以知世界最古最大之國，莫如貴國。今雖積弱，不可不勉躋富強，則歷史即富強之根也。¹⁸

此文乃柳氏記嘉納治五郎（1860-1938）「講義」語，嘉納時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在繆荃孫一行抵日後一周（1月27日）與之相會，引導他們考察學校。鑒於繆氏此行時間緊張、參觀內容龐雜，嘉納的講義反能集中反映繆氏一行考察的收穫。據嘉納所言，新式教學分為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前者為後者之基礎，而德育又是基礎中的基礎。如果說德育是對治人欲的根本問題「自私自利」，是普通教育的第一步；那麼國粹、歷史的教育則是普通教育的殿軍，俾國民之德行引生本國之富強。這種「東體西用」的模式，亦見於柳氏對日本國粹保存主義的描述，¹⁹而這當然也是新政、存古并重的張之洞希望考察者們看到并報告給他的。²⁰我們無法斷定，這次考察的經歷對柳詒徵有多麼重要。但是結合他民國時期論學的國族關懷，這一背景自有意義。

17 〈記早年事〉，《柳集》第11冊，頁254。

18 繆荃孫等：《日游彙編》，頁8，11。

19 同前，頁35：「日本維新三十餘年，事事效法泰西，而國中古禮相沿不廢，且於學校特設一科，所謂國粹保存主義也。中國新學家動詆古禮拘拙，飲食起居無一不欲改從各國，可謂知二五不知一十矣。」

20 把日本視為「中體西用」在東國的成功範例，其實頗有影響，一個內陸案例參劉光黃著，武占江整理：《劉光黃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0-21。

一九〇五年，柳詒徵離開江楚編譯局，前往高等學堂（後稱三江師範學堂）與商業學堂（後稱江南高等商業學堂）任教，此前在日本的考察經驗有了「用武之地」。他在這兩處的教學活動，分別助產了《倫理口義》與《中國商業史》二書。²¹ 或是受時風影響，二書皆頻繁使用天演、進化的辭彙，故有論者就此將早年的柳氏視為線性歷史進化論的支持者。²² 然細查《口義》開篇之家族、君國兩篇，柳氏在新、舊之間頗為含糊，很難從他筆下發現舊一變至於新、中一變至於西的必然性。《倫理口義》挪用宗族-軍國社會的社會進化論辭彙，就體現出這一特質：

日本舊俗，師法吾國，維新之後，日以軍國民為教。然井上哲次郎曰：「人與漠然不相知之鄰里，猶且相親，何故獨疏其戚族？」故有戚族之關係者，有戚族之關係者，其相視宜如家人。……宗族與軍國社會有關如此。然則吾國民雖以鑄造軍國社會為急，又惡得自棄其禮俗，而薄於宗族哉！²³

家族、君國兩篇的論述邏輯從《大學》化出，此處所引《家族篇·宗族》為本篇之殿，下啟《君國篇·尊君》，不無移孝作忠之意。論者有言，由嚴譯《社會通詮》引入的宗族-軍國社會概念，意在充實其之前所譯《天演論》體現的革新議程，催動國人走出不現代、封閉的宗法社會，塑造軍國社會所代表的現代國家。²⁴ 然而當嚴氏的譯著和主張進入輿論場之後，所引發的主要是各路士人基於自身文化-政治立場的斷章取義，而不是對歷史進化走向的學理探討——正如在此之前，康有為用他接收的進化論辭彙裝點自家的「公羊三世說」一樣。²⁵ 《倫理口義》亦近之。在此，井上哲次郎（1855-1944）是柳氏捍衛本國倫理的東國援軍，而宗族-軍國社會則是舊-

21 〈我的自述〉，《柳集》，第11冊，頁423-425。

22 Axel Schneider, "Critiques of Progress: Reflections on Chinese Conservatism", in Thomas Fröhlich and Axel Schneider eds., *Chinese visions of progress, 1895 to 1949*, (Leiden: Brill, 2020), p. 279.

23 《倫理口義·家族篇（宗族）》，《柳集》第2冊，頁128。

24 承紅磊：〈從「宗法社會」到「軍國社會」：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嚴譯社會階段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1期（2015年6月），頁213-244。

25 參茅海建：〈再論康有為與進化論〉，《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2期，頁1-69。

新體制之異名，意在表示由舊而新不必以除舊為代價。聯繫上文所論，我們不應強調此時的柳氏為線性進化論擁躉、主張新必代舊，而應專力考察他的進化論用語所反映的真實意圖，如《君國篇·教育》說：

居今日言教育必自國民教育始，進而至於社會，又進而至於宇宙。
（小字：康德謂教育主義非國家主義，非社會主義，又非個人主義，而為宇宙主義。必合世界所有之人教之育之，使底于完全，然後盡教育之能事。吾謂《中庸》言「修道之謂教，而其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論語》稱「有教無類」，皆所謂宇宙主義也。然宇宙主義只可托之理想，中國古代教育，固未能極其量。即歐美今日教育之盛，繩以此義，亦不過大輅之椎輪，長江之濫觴耳。）有階級焉，末可躐等躋也。國民教育，分家庭、學校二種。家庭教育，其略已具《家族篇》，本篇故專論學校教育。我國古代學校教育之權屬於天子，諸侯非命之教，不敢興學。則凡民之不能號召徒黨、建設學校可知。其後國家教育衰，君、師折而為二，儒先聖哲，始有以聚徒講學，補國力之所不逮者。沿及宋、明諸儒，講學必於書院，私家教授之外，別有公眾講習之所，其事殆與今日民間公立學校相近，然猶未能普及也。²⁶

《君國篇》所論的治平之事遵循「忠君-教民-成民-自治」的獨特邏輯，看似仍在尊君的矩矱之內。可此處引文對於所謂宇宙主義教育的設想，卻越出了家庭教育、君國教育的範圍。後兩者成為了隨順現實的權宜之計，遲早會被取代。此種進步主義的論說，頗為新穎。但是，這並非是強調新在當下必然取代舊，而是說舊會在未知的將來讓位於新。柳氏指出，新的、宇宙主義的教育理想雖然是今人從西方哲人處發現，但在《論語》、《中庸》當中也是可以找到的。與戊戌時期康有為的學說比較，柳氏言論同樣可以解讀成一種看似尊君、看似反對躐等，但卻有「保中國不保大清」嫌疑的學說。他的尊君立場產生于和政治現實的妥協，而在理想的教育中，

26 《倫理口義·君國篇（教育）》，《柳集》，第2冊，頁138。宇宙主義或為 universalism 之東文譯名，此處暫時無力深論，留待高明發覆。

尊君并非必要。²⁷把實現政教理想的手段寄託于師道而非君道，誘生這種嫌疑是難免的，此亦崇古之思與清末時風共振并進之表現。

此外，引文「國家教育衰，君、師折而為二」透露出的意思尤其危險。儒教理想中的君師道合之崩解，在此屬一種歷史的必然。進言之，宋明講學昌明師道、將教育大權從天子受眾接過，不僅是理勢固然，而且是具有進化意味的歷史現象。如果講學能進一步普及，就能達到「今日民間公立學校」的程度。下文《群倫篇·廣師》引述泡爾生（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的觀點，主張學者當以入社會為進學校，受教成德，²⁸是對儒家人世理想的一種「民主化」闡發。另外從以下對自治的系統表述還可發現，柳詒徵在清季的新、舊之間何以趨新、又何以守舊：

吾國之注重地方行政，其來已久，正不必盛稱歐化，詭為前古所無議者。或謂元、明以降，地方政務悉隸屬於長官，人民參政之權，微弱已甚。今之國民所以遜于歐美者其弊在此，則復鄉官、立議會，監督財政、選舉職員，以自治伸民權，正今日之急務也。不知自治云者，不難於得權利，而難於稱名實。使以自治之名，獲自治之權，而無自治之能力，或反行其自私自利之計，則其所為，適足以自亂其地方，惡足以云治哉？²⁹

在前文所述的嘉納治五郎講義中可以看到三個關鍵詞：德育、禮教以及歷史。《倫理口義》中的教育首先是德教，而要講明德教是什麼，就需要取資本國歷史經驗、歸本固有禮法。由此，《口義》也就成為了取本國政、教之史跡與外來觀念互證的著作。趨新，是因為柳氏完全接受新的政

27 茅海建：〈戊戌時期康有為「大同三世說」思想的再確認——兼論康有為一派在百日維新前後的政治策略〉，《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1期，頁79-117。

28 《倫理口義·群倫篇（廣師）》，《柳集》第2冊，頁138。根據目前研究可知，王國維在1902年即開始接觸泡爾生的思想，並在1906年於《教育世界》刊出了柳詒徵此處所引《教化論》的譯文（參巴爾善：〈教化論〉，《教育世界》126號（1906年閏月），頁22；佛維：《王國維哲學譯稿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225-239）。我無法獲得《口義》稿本、確定此書寫作時間，目前只能推測通過江楚編譯局的工作，柳氏能比較快速地接觸到《教育世界》的譯文。

29 《倫理口義·君國篇（自治）》，《柳集》第2冊，頁144。

教標準，例如這裏「昉自英國」³⁰的自治；守舊，是因為柳氏認為這些標準在中國已有，只是因為一些不可預知的退化暫時衰歇而已——「今之國民所以遜于歐美者，其弊在此」。更重要的是，趨新不可徒驚名相（「不知自治云者」正是駁難此類歐化派），而是要根本德教、學習歷史，培養人民自治的能力。這與前述訪日考察的經驗是有關係的。以下轉向柳氏在清季編纂的兩部史著，觀察這些譯述中的思想表達。

二、在譯述中調和新舊的努力

在商業學堂的講義《中國商業史》與《歷代史略》不同，跟同期的《倫理口義》接近，可以看到柳詒徵的著述意識，也可以視為柳氏的首部史著。在對一九〇六年新學的一篇總結性評論當中，柳詒徵認為適當的教科書乃是精深的研究作品所必需的初階。而這種研究本國文明的開山導水之作，非有力抉發學術精義者不能為。³¹拿《中國商業史》來說，該書具有明確的崇古意識，或者說獨特的宗周、尊《周官》的意識：

文王之時 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者多歸本於教化。不知其重實業、興民利，關市道路諸政委曲詳盡如此。即孟子述文王治岐，亦僅著「關市譏而不征」數語。微周公言，熟知文王之政策哉？³²

推其行政之意，始之以董勸，以興其業；繼之以樂利，以遂其情。規畫精而無苛矯，禁令嚴而無蠹害，雖今之歐美各國經營商業、慎立良法，何以過之？又如《秋官》朝士之職，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小字：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其法雖不詳，疑必有如近世各國公司制律者。

33

30 《倫理口義·君國篇（自治）》，《柳集》第2冊，頁144。

31 〈《新學書法》序〉，《柳集》第8冊，頁237。

32 《中國商業史·周初之商業·周公追述文王之政》，《柳集》第2冊，頁11。此處根據的「周公之言」引自《逸周書·大聚解》，文繁不具引。

33 《中國商業史·周官之商政·結論》，《柳集》第2冊，頁24。

柳詒徵明確的宗周意識和他的文獻意識是難以分開的。誠然，先周與周代有過理想的政教典範，具足今日政教的許多要素，但是沒有文獻就不能坐實。正是由此，周公之言纔如此重要。從備載周公之言之政的《周官》當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近世商業公司的雛形——雖然不得不借助於漢儒的注解。³⁴柳氏意在說明，在本國歷史中發現近世文明帶來的新知（例如有關「商業」的知識）乃是可能的。除去用世意味濃厚的戊戌時期之康、梁，這種嘗試也與孫詒讓（1848-1908）、廖平（1852-1932）和杭辛齋（1869-1924）等前輩經師同調。在《倫理口義》和《中國商業史》兩部教科書以後，署名黃紹箕（1854-1908）所著的《中國教育史》，更全面地體現了的柳氏通史之學。

瑞安黃紹箕的交遊與政學經歷，跟柳詒徵有頗高的重合度：他有經世志趣，與康有為有過密切來往；他在一八九七年後參與湖北學務，從鄉試考官做到湖北提學使，深受張之洞賞識；他的父親黃體芳在擔任江蘇學政時期參與創辦了南菁書院。³⁵而正是經由南菁學人陳慶年的介紹，柳詒徵方得根據黃氏所遺條目材料、深入輯補文獻而成《中國教育史》。從柳氏一九五一年的一件跋文來看，他誠懇地認為此書是他寫定。³⁶故就此合著之書試探柳氏學思之發展，確有可為。

《教育史》乃宗周之書，也是宣揚官師政教合一之書。該書引述了西哲「人為倫理之動物」、「人之為人，由於教育」的論點，認為這是黃帝教的題中之義。並將禹帝和有扈氏的戰爭描述為「宗教戰爭」。³⁷皆有清季新學之風味。更為重要的，是此書對周代政教的論述：

34 《秋官》此文與鄭眾（?-83）的注解為柳詒徵所樂道，參《中國文化史·周之禮制·市肆門關之政》，《柳集》第6冊，頁163-164。

35 對黃氏政學生涯最新的介紹參王靜：〈黃紹箕與清末學堂教育研究〉，《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頁57-67。

36 〈《中國教育史》跋〉，《柳集》，第8冊，頁449。

37 分見《中國教育史·中國古聖人教育大義》，《柳集》第2冊，頁162；《中國教育史·虞夏文明大概》，《柳集》第2冊，頁184。

周代教育之品，便於夏、商，故其授受移寫，足以廣文字之流布而啟學者之問知。謂曰方策時代，誰曰不宜？³⁸

教育以政事為根本。政事不修，教育不可得而善也。周時政治之主義與教育之主義同條共貫，故其教育主義可以實行於朝野。³⁹

首段引文是沿《商業史》宗周理路的發展。先聖之道布在周人方策，非求諸周制文獻，不能知先聖之政教。再者，周人政教朝野一貫、體智并重，兼體、德、知三教。倫理其先、方冊其末，而以體質鍛煉統其中，為古人理想的政教狀態。⁴⁰ 但正如中西不能不相遇，舊學不能不面對新潮，周代官師合一之教，也會在歷史進程中面臨困境：

官守世學，為古今教育不同之大關鍵。周之教育所以盛者，在此；所以衰者，亦在此。蓋世官世學，其業專、其心一，食舊德之名氏，父詔而兄勉焉，學術之所由光大也。然典章制度私之一家，傳本既希，沾溉弗遠。子孫之秀而靈者，固能保家學而綿世澤，其不賢者則數典而忘。……故教育普及必不可專恃官吏，使人民懵然無知、所自為謀。古代埃及印度，文教非不甚盛，迨其後國既不振，學術亦從而日衰者，亦由國家階級之制甚嚴，司教學者非凡民所得與也。⁴¹

《教育史》在此節論述中使用《左傳》之「數典忘祖」事例與埃及、印度的事例用來說明官守之學的歷史困境。通過對不同古代文明的比較，柳氏判斷世官世學如果要長存，須得向本家之外的學者開放。另一方面，社會上的學者也應該追慕世官世學之典型，朝、野雙方合力，纔能維持文

38 《中國教育史·周為封建時代又為方冊時代》，《柳集》第2冊，頁195。

39 《中國教育史·周之教育兼體育、德育、智育三義》，《柳集》第2冊，頁198。

40 《中國教育史·女學及胎教》，《柳集》第2冊，頁215。本節崇尚古人，又說古人不似後人耽溺形上之學，有顏元刻意與宋學作對的風範，顯然有些突兀。因為《中國教育史·成人》，《柳集》第2冊，頁237）。該書矛盾的表述是來源於柳氏學思不諧，還是源於黃紹箕遺留原稿有反宋學議論？無從得知，只能期待新資料的披露。

41 《中國教育史·科學皆世官世學》，《柳集》第2冊，頁248-249。

教之盛。該書下文據〈性命古訓〉之言，申說周人政教知行合一的典範意義，供後學追摹。⁴²世官世學體制隱退、學問開放之後，將周人官學和人民距離拉近的人是孔子——這也是後世歷史上中國人的「本教」。⁴³孔子示後人以追摹古人典型之道，然其教育之道卻未得遵循：

今世各國卒業于大學者，得受高等試驗，服官從政，故孔子於十子，亦以仕進期之，其他如漆雕開之未信，子張之干祿，皆不與四科之列，則其難可知。而孔子教人，必主於用世，亦可因此推見焉。……明乎仁之待人而見，則知孔門所謂「德行」，皆指治人之道，而言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為政者萬變不可或離之宗旨。後世以苟且刻薄為政，而以德行無與於政事，其悖於孔子之教育大矣。⁴⁴

柳詒徵的學問是基於信古的崇古之學，亦是宗周、尊孔，強調知行合一的學問。《中國教育史》的敘說包含了上述要素。這些要素，也能在柳氏後來的著述中找到不少痕跡。另一方面，士風時政之惡濁使得踐行政治理想非常艱難，心存古道的讀書人在此處境下，須得集中精神，在學問教育領域顯揚理想。其旨趣崇古不變，方式、語言和詞匯則不能不隨民國之世變而變。⁴⁵

42 《中國教育史·天命性道之教》，《柳集》第2冊，頁277。

43 《中國教育史·本教》，《柳集》第2冊，頁282。

44 《中國教育史·四科》，《柳集》第2冊，頁298。

45 其實所謂的「宇宙主義」之提法，已經反映了堅持崇古之餘的措辭變化，此承本文外審人點出，謹致謝意。

參、新共和與舊典範

一、《中國文化史》論政教典範

限於書信、日記類文獻之匱乏，我們對柳詒徵在民國前期的學問與生活瞭解得不多。柳曾符的傳略於此亦著墨較少。其間值得一記的人生「第一大變」，是辛亥-壬子參政之事。⁴⁶根據一份日期不詳的回憶可以得知，膺孔子之教、懷用世大志的柳詒徵，在辛亥革命之後進入丹徒縣議會就任副議長。他主筆上書江蘇都督，希望為鎮江爭取到數十年喪失的市米之權，重振本地商業，未能成功，此為其一。丹徒民政長楊邦彥（1857-1936）和縣議會爭權，見柳氏好放言議事，遂在外散佈流言、欲去柳氏而後快。另一方面，在柳、楊一次短兵相接的爭論中，和柳氏相熟的師長陳慶年竟未能給他足夠的支持，面對楊氏「柳某收錢」的指控反「領首」不辯。⁴⁷後來，丹徒執事諸君又偶然捲入江蘇新軍嘩變風波，焦頭爛額。柳氏遂更無做官之心，轉入學務。

在辭職一年後（1913），柳詒徵前往北京明德大學擔任教師。從他寫給繆荃孫的信中可推知，柳氏對這份背井離鄉的工作不甚滿意。⁴⁸這或許也是為什麼他在三年後（1916）又返回南京高師工作的原因。一九一九年，繆荃孫撒手人寰，陳慶年癱瘓在床，「五四-新文化」運動也達到了高潮。本年前後，柳詒徵開始準備《中國文化史》講稿。⁴⁹此書與同期抄撮而成的《北亞史》一類大不相同，是柳氏崇古思想的系統表述。《文化史》在一九二一年寫畢以後的版本，目前不得而見。因《學衡》刊發需要，吳宓在一九二四年閱讀了《文化史》全稿（同時還讀了任公《先秦政治思想

46 申者：〈柳詒徵傳略〉，《晉陽學刊》編輯部編：《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5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6-257。

47 〈壬子蘇門記事〉，《柳集》第9冊，頁9-13。

48 〈致繆荃孫函〉，《柳集》第12冊，頁145。

49 蔡尚思認為柳詒徵在1919年即著手準備此稿，鑒於他和柳詒徵在1930年左右就有密切交往，可採信其說，見蔡尚思：〈《中國文化史》導讀〉，收入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

史》），然未有評論。⁵⁰論者判斷此書的影響力擴散開來，是在一九三一年鐘山書局重印以後的事情⁵¹——也就是說，此書撰成是在《學衡》興起之前，真正大熱又是在《學衡》派星流雲散之際。無論如何，將《文化史》視為柳氏二十年代前期的思想文獻，是妥當的。

一九二一年，柳詒徵在南高的學術陣地《史地學報》上面刊出了名文〈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該文一般被視為柳氏文化保守派形象的標識。在批判梁、胡疑古之論的同時，柳詒徵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學術立場：「若無劉歆，則公等從何知其謬？」⁵²這讓我們想到了前文「若無周公之言，今人何以知周制，又何以知上古」的看法。同樣，《中國文化史》以表出民族全體精神（文明）為關懷，以為後來研究者發凡起例自居，⁵³這跟柳氏輯補《教育史》之際的心思也是類似的。雖然徵引了陳漢章、夏曾佑和章太炎等舊學家的新史著，但《文化史》仍然是基於柳氏自得之見組織而成的歷史。其中由黃帝之教進于周制的線索就是證據：

按井田之始專為塞爭，亦猶市易之使人各得其所也。土地所有權雖屬公而不得私，而八家各遂其私，是實限制私產之意，特求私產之平均耳。《通典》所言十利雖詳，而授受之法，初未陳述。疑黃帝時僅肇其端，亦未遍行於各地。歷唐、虞、夏、商而至周，始詳制其授受之法也。⁵⁴

此處引文的最後兩句，和《商業史》裏面推論上古中國就有公司和公司法的文字在形式上是一樣的。此外，《文化史》談周代為方策時代，論宗法-軍國社會進化史觀忽略了孔子教化、國民德性的應有位置，又分別是《教育史》、《倫理口義》相關內容的發展。⁵⁵在各類新義當中，最突出的

50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1917-1924》（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頁307。

51 參孫文閣：《柳詒徵史學研究》，頁115-116。

52 《柳集》第9冊，頁41。

53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上海版），頁7。

54 《中國文化史·家族及私產制度之起源》，《柳集》第6冊，頁21。

55 《中國文化史·忠孝之興》，《柳集》，第6冊，頁89；《中國文化史·文字與學術》，《柳集》，第6冊，頁213-218。

莫於柳氏對「無私」的闡發。古之有德者為政，不會自私自利，而是「就天道自然之秩序闡發而推行之，直無所用其一人之主張」。⁵⁶不過，夏代文字不可知、上古政教不得詳，今人只能從《大傳》等漢代文獻中倒推《書》中聖王為政之風貌。諸如「君者能群」的闡發，殷人遷都乃貴讓不貴爭之類，都只能算碎片化的政教精義。⁵⁷大概是預料到了疑古者的責難，加之有整合經學資源的意願，《文化史》解釋了周制之淵源，俾古道連貫周制。中國文化根源上古、生化不斷之實，於此可見：

三代制度雖有變遷，而後之承前大都出於蛻化。即降至秦、漢學者分別質文，要亦不過集合過去之思想為之整理而引申。必不能謂從前絕無此等影響，而後之人突然建立一說，乃亦條理秩然，幻成一烏托邦之制度。故謂《王制》完全系述殷制未免為鄭、孔所愚，而舉其說一概抹殺，謂其中絕無若干成分由殷之制度鈎繹而生者，亦未免失之武斷也。⁵⁸

如此一來，「唐、虞、夏、商而至周」的政教傳承呈現出愈往後愈可考的樣態。周制是好的，古制亦是好的；周制是可以確證的政教典範，然古制亦是不應抹殺的政教事實。周代的法積道備之制，并不妨礙其先河之善端，故曰「蛻化」而非「進化」。⁵⁹由此，前述帶有進化色彩的孔子改革神道教之論，在《文化史》的敘事中也不再凸顯。相應的，文王、周公成為了「哲學王」。⁶⁰在有德有學的王者制定的規模之內，官禮庶務各有史掌，有德有學者各有職位以發揮其學。或有弊政，賢士大夫議論亦足以

56 《中國文化史·唐虞之政教》，《柳集》，第6冊，頁64-75。當然柳氏也沒忘記提示學者，禪讓不能看成是比當下的共和政治更為高尚者，參《中國文化史·唐虞之讓國》，《柳集》第6冊，頁55。

57 參劉博滔：《「舊瓶」裝「新酒」——柳詒徵文化史書寫之兩歧》，頁21-25。

58 《中國文化史·傳疑之制度》，《柳集》第6冊，頁122。。

59 〈中小學歷史教學的意見〉，《柳集》第9冊，頁86。

60 此處引用了謝無量（1884-1964）《中國哲學史》的說法，參《中國文化史·周室之勃興》，《柳集》第6冊，頁130：「以哲學家主持國政，是實吾國之特色也。」謝書亦藉鑒東人之書而成，那麼「哲學王」是否也是此路舶來品？待考。

維持君民共和。⁶¹ 如此則民主雖然不見於古代，但今日共和的精神已由中國讀書人發揚於古代矣。不僅如此，周代政教的餘波還能與秦政之惡相抗：

蓋以吏為師，猶能通知當世之務，視專讀古書而不知時事者，其教猶近古而較善耳。周代教民，最重讀法，漢之學童，亦籀尉律。是周、漢皆使人民學法令，以吏為師也。……政府立法，恃國民之推行，民力不充，雖有良政府亦無如之何。民能自立，政府雖強暴壓制，亦不能阻其進取也。吾觀秦史，頗見秦民進取之跡。⁶²

以吏為師的秦漢之政，承襲了周制知行合一之教的優點。這一優點可以充實民力，讓人民在為惡政、專政的統治者出現時也能保持文化上的進取。但好景不長，柳氏指出，秦漢以後的文化中衰，一大原因正是「哲學王」被無賴之徒取代。在此，中衰不能與「退化」等同。一方面，政教合一的周制不得不面臨「國家階級之制甚嚴，司教學者非凡民所得與也」的困境，若令聖王長時間缺位，則漢後之衰敗在所難免；⁶³另一方面，後世以科舉、神道為教，雖不如世官世學的周代之盛，但并非沒有重光之幾。柳氏論宋代政教復興有言：

隋、唐外競雖力，而風俗日即於奢淫，士習日趨於卑陋。皇綱一墜，藩鎮朋興，憚將驕兵、宦官盜賊，充塞于唐季、五代之史籍，人群焚亂極矣。物極則反，有宋諸帝，崇尚文治，而研窮心性，篤于踐履之諸儒，乃勃興於是時。⁶⁴

蓋宋之爭執，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純出於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為然。……論史者恒以宋之黨禍比于漢、唐，實則其性質大不相同。新舊兩黨各有政見，皆主於救國，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

61 《中國文化史·文字與學術·共和與民權》，《柳集》第6冊，頁212-228。

62 《中國文化史·秦之文化》，《柳集》第6冊，頁331。

63 《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東來之故》，《柳集》第6冊，頁383-388。柳氏指出，即使在中衰時代，中國文化亦非是從黃金時代墮落的線性退化狀況，而是不時有創造性的新發明，參《中國文化史·三國文物之進步》，《柳集》第6冊，頁438。

64 《中國文化史·宋儒之學》，《柳集》第7冊，頁570。

主張得異，遂致各走極端。縱其末流，不免於傾軋報復，未可純以政爭目之。而其黨派分立之始，則固純潔為國，初無私憾及利祿之見羈雜其間。此則士大夫與士大夫分黨派以爭政權，實吾國歷史上僅有之事也。⁶⁵

《文化史》將《商業史》、《教育史》二書崇古宗周以致用的旨趣發揮完備。發言宗周之旨不掩前代之善，不絕後代重光之可能。中國歷史有進有退，對於今日學者而言，崇古貴德、致用當下，乃取進舍退之道。本國有三代周制，後有北宋政黨政治，都是士人大公無私、學以致用所成就的政教典範。欲求共和自不必一味向外討求。《文化史》談民初，一則重視漢文之存廢，一則重視外國宗教對本國教化之擾動，皆有深意。⁶⁶評駭新文化特其末節耳。要言之，柳氏學思中的文化、商業、教育乃至「文明」皆「史」之枝葉，崇古、鑒往以論今，乃「史」之主幹。

二、以古道應世變

柳詒徵在抗戰之前發表於報刊雜誌上的文字可以分為三類。《史地學報》和圖書館學的文字側重論學，《學衡》的文字是以論學的形式談時事，其它文字則多側重評論時事。其中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間刊於《學衡》的文章隱成統系，值得表出：

官尚法，民尚德；官尚利，民尚義；官尚勢，民尚理；官重救時，民重法古；官重進取，民重保守；官重興業，民重務本；官主集權，民主均富；官主救弊，民主正俗；官主國防，民主內治；官主拓殖，民主文化；官主實行，民主理論。卒致官吏理絀詞窮，不得不從全國之民意而罷權酷。嗚呼！此吾國人民代表以正式選舉、正式會議發表民意戰勝官吏之一大紀念也。綜觀漢代會議之事蹟，任人而不任法，議者無定員，會者無定期，隨事召集，不

65 《中國文化史·政黨政治》，《柳集》第7冊，頁579-582。

66 《中國文化史·最近之文化》，《柳集》第7冊，頁959-967。

立權限，裁可之柄，一在人主，其與今世法治國國會之性質大相徑庭矣。然正惟其不拘於法，故重精神不重形式，正言讜論乃得自由發據，無所撓屈。⁶⁷

此文被論者視為柳詒徵以今釋古之證據，⁶⁸然考察此段引文及其語境，可知目的主要在於批判「金錢賄買」。蓋二十年代之議員在柳氏看來，如同之前旁人對他的誹謗一般，都是金錢運動而來。引文當中漢代會議的偉大事蹟是柳詒徵從《鹽鐵論》當中整理而來。裏面代「民」抗辯的士人是否就能代表今人所理解的漢代之民，柳氏認為可以。進言之，這些人在之前是周禮所造就的周士，在後來也是講學維持世教的宋明之儒。有人而後法可以行，故今人拘泥西方法權，真不足以知中國古賢精神也。《學衡》此後刊載之〈論中國近世之病源〉與〈選舉闡微〉亦矛頭直指民初之金錢政治及其惡果。前文歷詆李鴻章、康有為等近世新政聞人，以為尚不如尊孔尚德之迂腐書生，而京滬之間道德淪喪的城市文化亦有待孔子之教救贖。⁶⁹後文以為選民與代表終為資本力量操縱，今人不妨反求諸中國古人之德治、禮治理想——哪怕《周官》所言，只是理想。⁷⁰

要之，人之德性、人格重於人之權利。有成人之人，纔能成就基於真正公益的自治典範。故柳氏崇古宗周、與新人辯難，也是批判中外之錢選政治。翌年（1923），柳詒徵又有〈中國鄉治之尚德主義〉、〈說習〉之作。前一篇長文認為中國古人「不專重在爭民權，而惟重在淑民德」，宋明諸儒之民治理想，在今日猶可對治金錢政治之弊。⁷¹後文主張以己之善吸收他人之善，不以己之不善合他人之不善。⁷²一九二四年，柳氏現身梁派陣地《學燈》，發表〈什麼是中國的文化〉，採取康（此為柳氏所深鄙者）、梁不同時期的歐洲有取于東方文化論，為中國文化作辯護。此文被

67 〈漢官議史〉，《柳集》第9冊，頁87-98。

68 茅海建：〈論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期間的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中國文化》，2017年第2期，頁211。

69 〈論中國近世之病源〉，《柳集》第9冊，頁118。

70 〈選舉闡微〉，《柳集》第9冊，頁124-125。

71 著重參閱〈中國鄉治之尚德主義〉，《柳集》第9冊，頁263，298。

72 〈說習〉，《柳集》第9冊，頁300-303。

視為柳詒徵將《中國文化史》射向輿論界的一支利箭。不過根據時人反響來看，《文化史》重視固有倫理的政教理想只是謬談。⁷³一九二五年爆發的東大易長風潮，很快讓柳詒徵體驗了一次新潮的威力。

論者認為此次風潮本質上是東大校長郭秉文（1880-1969）與國民政府教育部之間矛盾的發展。⁷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東大南高成為一體，南高宿老柳氏自不得置身事外。只是陰差陽錯，貴德守舊的柳詒徵卻站到了革命的國民政府一邊。郭秉文被教育部罷免引發了學生的抗拒活動，最終成功留職。在柳氏看來，舊的東大很腐敗，學生被教育成了易於鼓動的社會渣滓；⁷⁵在郭系師生看來，守拙的書生柳詒徵卻不是書呆子，而是黨國的內應。在一九二五年五月，柳詒徵登報說明自己被託名「馬相伯」的某人詆毀。次年，柳氏在《學衡》發表文字，稱中國「故職業有界，知能有界，惟墨化無界」，⁷⁶語氣憤激而絕望，與此前據古論今的學人氣度截然不同。在此，不妨回顧他一九二二年在《史地學報》上面的一件文字：

故在今日軍閥官權橫行無忌之秋，吾民惟有消極抵制，使官吏感受財政之困難，始可促其覺悟，然此實非厲行民治之正當方法。欲行民治，須樂於輸稅，而嚴於監督，用途一絲一粟不得隱匿，亦不得浪用。苟為興學養民之要務，雖歲增千百萬亦一致承之而不憚。此吾所敬為江蘇人民告者也。⁷⁷

前文稱《史地學報》側重論學，此段評語也是在羅列、分析了江蘇省稅收之後所附的評論，表達了柳氏對新共和國的期許。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柳氏赴東北任教，又看到了奉系的諸多醜態，未逾年而去之。⁷⁸次年，

73 〈什麼是中國的文化〉，《柳集》第12冊，頁205。此文反響參劉博涵：《「舊瓶」裝「新酒」——柳詒徵文化史書寫之兩歧》，頁30-54。

74 以下論述，原本李中平：《前學衡時期的柳詒徵》（南京大學中國近代史碩士論文，2015年），頁41-51。

75 〈罪言（一）〉，《柳集》第10冊，頁12。

76 〈墨化〉，《柳集》第10冊，頁117-118。此文談「墨」，意指國人為金錢運動，不乾不淨。

77 〈江蘇之財政〉，《柳集》第9冊，頁91。

78 〈遼鶴危言〉，《柳集》第11冊，頁24-26。

他返回南京擔任江蘇圖書館館長，兼任東大重組為第四中山大學的籌備委員。根據柳氏自述，他在履職之初就動用自己的知識儲備，起到了監督財政廳長「興學養民」的作用。⁷⁹然讀書人要發揮作用、贊襄共和，又有賴各級機關謹其官守的環境，柳氏一九三〇年之名文有言：

吾國自古設官分職，各有其權限而不使相侵。其於政治之組織，至明確矣。職權雖重，而非其所當問，弗之問也。即有課殿最行賞罰之權，亦必待所屬之報告，不必執一事以相繩。以故大小相維而各專其職守，譬之今日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固由百事草創，未嘗有精密之分畫，然而大端不難知也。某一機關有統治某一機關之權，而所統治者不能舉其職，則統治之者從而督責之可也，指導之可也，乃至變易之可也。若以上級機關擅奪下級機關所相沿治理之事，為之代庖，己為越職侵權。……是則強有力者，不特對於團體不能爭，即一民一物，苟非其所當求，亦不可以妄爭也？此皆習見之事，非冷僻罕見者。然而此乃真正之文化，熟復而詳體之，於政治之系統，有莫大之裨益。正不必炫鬻骨董，求人間未見之書而讀之也。⁸⁰

此文因殷墟發掘之事而作，暗諷中研院侵奪河南省地方的文物保管權限，綿裏藏針、高妙絕倫。在本段引文當中，柳氏在共和法治的大義名分當中寄託了自己的政教理想：各級機關當珍重權限、各保官守；讀書人應于習見之文獻中體味真正之文化，不必求人間未見之書而讀。故此文一出，傅斯年（1896-1950）不得不火速撰文為李濟（1896-1979）一行發聲。然而在史語所的研究報告公佈前，面對各種誅心之論，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新派學者們自是百口莫辯。殷墟發掘也在本年暫時告一段落。⁸¹值得玩味的是，無論是此事還是之前的東大易長風潮，柳詒徵都堅定地站在了強勢方一側。誠然不能說柳氏乃趨炎附勢之輩，他在世變之中對崇古尚德的理想以及此中各種文化關切的堅持，都是真誠的。但也必須看到，理想的政教典範之

79 〈我的自述〉，《柳集》第11冊，頁426-427。

80 〈論文化事業之爭執〉，《柳集》第10冊，頁338-339。

81 對該事件最新的討論參岱峻：《李濟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頁108-124

實現，不可能離得開自上而下的強權所支撐的建制。⁸²出於在新共和中保存舊典範的熱忱，柳詒徵的學思在抗戰期間有了新的發展。

肆、承周制以作新民

一、國族危機下的舊學

一九三一年，柳詒徵在《大公報》上面發表的文字提到：「滿清變法不認真變法，立憲不認真立憲，所以亡國。而民國依然不認真，共和不認真共和，革命不認真革命，奮鬥救國，不認真奮鬥救國。紙上談兵，幻術搬演，何能有濟？」⁸³總的來說，他在三十年代的學思發展更加側重學問作為義理權衡之根本、側重學問對普通公民個人的意義。作為《國史要義》之前的一部系統性文稿，柳詒徵一九三二年在河南大學的史學講義就以治史需知義理權衡為開始，以治史有應變全身之效為結尾。文末引朱熹對《老子》的評語為證，與後來的《國史要義·史原》一致。⁸⁴在和蒙文通（1894-1968）、李源澄（1909-1958）的通信中，柳氏的尊儒、宗周立場愈顯牢固，其經世意圖也隨之熾烈。⁸⁵一九三四年，柳詒徵在曾為作發刊詞的《國風》半月刊發表了一篇與前述〈論文化事業之爭執〉交相輝映的文字，記錄了他當年的一次演說：

近百年來自道光以後，大多持此觀念，以為中國的政法、道德、生活，都比不上各國，儘量模仿他國的物質文明，真是所謂盡棄其學而學之了，學得沒有成效；又以為是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沒

82 例如金陵書局在革命後因為中央收權，地方無財，無力保護。故柳詒徵撰寫〈國學書局本末〉，向社會與政府陳情，參《柳集》第10冊，頁391。他用心勾連三民主義和忠孝綱常的言論，又參〈地方改造與文化保存〉，《柳集》第12冊，頁231。

83 〈罪言（二）〉，《柳集》第11冊，頁12。

84 〈談治史方法〉，《柳集》第12冊，頁281。

85 相關文獻參〈覆李君書〉，《柳集》第12冊，頁156；〈覆蒙文通書〉，《柳集》第12冊，頁158；蒙文通：〈致柳翼謀先生書〉，蒙默整理：《蒙文通全集·史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頁480-481。

有完全放棄，於是乎便發生五四運動，整個的把中國固有的學問文章、倫理道德一齊推翻不要，纔能趕得上西方的物質文明。自從有《新青年》雜誌提倡之後，無不高聲疾呼打倒中國的舊文化，以致許多的青年也都受了他們的影響。……主張如此辦法。可是西洋的文明吸收了些皮毛，衣食住行雖是改頭換面，模仿了西洋文明，這樣便把中國人的自信力喪失了！近來也有厭棄這種思想的人，便復返于追求中國原來文化的忠心，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運動，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由五四運動以來，已經給我們有不少的經驗，知道整個的廢除中國舊文化來改造國家，還是沒有效驗，反轉將國家的原氣斫傷，民族的自信力喪失。……現在聽到君臣的名目，便以為是專制的帝王壓迫臣下，不能有獨立的人格存在。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面說，古人只教人做兒子，不是做人，這豈不是笑話，做了兒子便不是做人了嗎？那末做夫婦、兄弟、朋友、君臣都不是做人了！再說到君臣的解釋，無論什麼地方都有君，譬如對人稱呼總稱為某君，學校的校長，商家的老闆，都是君。今天的演講會顧先生當主席，他就是君，主持今天演講會的事情，如果諸位都要做主席，這會的秩序就要紊亂了。從前的君臣，上有天子下有諸侯，君臣的地位是相對的，諸侯對天子說就是臣，而對卿大夫就是君了。像現在的省政府主席對中央政府是處於臣的地位，而對地方官就是君了，並不是說共和國體是沒有君臣之分的。這種相對的關係，從古至今都沒有改變，由父子推及君臣，是由天性發生的。養成犧牲一己之心，抱有幫助他人的熱誠，在家庭裏養成這種習慣，到了社會團體裏，就肯幫助主持的人為公服務了，這就是中國文化根本的精神。《易經》說「觀乎人倫以化成天下」，這「化」字和現在所謂紀律化、平民化相同，但並不是在紙上空談的，乃是實際上的潛移默化。⁸⁶

86 柳詒徵講，柳定生記：〈對於中國文化之管見〉，《柳集》第12冊，頁286，290。此處不知是柳定生誤記還是柳詒徵原話，「人文」寫作「人倫」。

本段講辭引文較長，然表述清晰直截，不煩解釋。自「民族的自信力喪失」以上，是以批判新潮的方式宣揚崇古的立場。此後的文段，則是將政教合一的古代理想化入當局提倡倫理、犧牲的文化議程當中，手法精妙而站位明確。無論是這種化用，還是對《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具體批評，⁸⁷都體現出了強烈的應時之意，與柳詒徵二十年代的文字不類——倒是讓人想起了三十年前寫的《君國篇》。

在一九三五年前後，柳氏對義理之學的重視與時代實在有太緊密的聯繫。〈《唐荊川年譜》序〉言：「居今日而講切實有用之學，宜反之宋明而上躋于孔門」。⁸⁸柳氏觀察發現，在此潮流下的居士學者歐陽竟無（1871-1943）、江易園（1875-1942）與唐大圓（1885-1941），也都自覺溝通儒佛、昌明愛國化俗之道。由此可見，新生活運動確實是順天應人、返本開新的舉措。⁸⁹隨著抗戰局勢的發展，政與學，柳詒徵與國民黨的互動也在不斷深入。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上饒文化設計委員會聚會上的演講中，柳氏重申了中國之教本孝的老觀點，並追溯了從總理、總裁到堯舜之道統。⁹⁰此時，他的身份是「第三戰區黨政分會委員」。⁹¹那麼國族危機之下的舊學，在應時的變化以外，是否仍有自生之新義？

二、《國史要義》、《禮俗史發凡》述論

答案是肯定的。在柳詒徵最後的著作《國史要義》和《禮俗史發凡》裏面，我們確實可以看到對政教合一理想更為新穎的闡釋。《要義》是柳詒徵在抗戰時期的講義，初版於一九四八年。從開頭的《史原》、《史權》部分在《國立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的刊出日期推斷，全書定型日期應在

87 此處對胡適《大綱》得罪名教的批評，是否只是轉述？尚不可知。柳詒徵雖經常或明或暗地批評新潮與胡適，但刻深至此者難得一見。據熟稔祖父生平的柳曾符之記述，雖然私下意見不少，柳氏與胡適的關係在明面上相當融洽，參〈柳詒徵與胡適〉，收入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188-191。

88 〈《唐荊川年譜》序〉，《柳集》第8冊，頁358-359。

89 〈三年來中國之文化教育〉，《柳集》第11冊，頁171-188。

90 柳詒徵講，周蛟騰記：〈中國文化的認識〉，《柳集》第12冊，頁311-313。柳氏重視此文，在月初發表後，又專門給報紙寫信訂正錯誤（《前線日報》，1942年3月26日）。

91 徐則：〈我與柳翼謀先生〉，《鎮丹金漂揚聯合月刊》第3期（1946年3月），頁22。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間。一九四五年刊於該《季刊》的〈從周官觀其時社會〉揭出《要義》衡論中國史學一本《周官》的宗旨。⁹²再從柳詒徵在一九四六年所作的一件跋語來看，他有打通《春秋》與《周官》兩經的意願。⁹³按早在《中國教育史》當中，柳氏就已從世官失守的角度閱讀《左傳》，此處自然不是臨時起意。可是，從《周官》的一代典制讀出足以裁斷萬世政教是非的大義、進而撰成貫通二經之書，乃是非常困難的任務。在寫作《國史要義》和《禮俗史發凡》時，年邁體衰的柳詒徵勉力承擔著這一任務。

《國史要義·史原》將史官所持之禮視為全史之核心。如何理解這一判斷？柳詒徵指出，國史的出現，是擔任史官的古人運用理性裁斷人事是非的結果：

他族史籍注重英雄宗教物質社會，第依時代演變，而各有其史觀，不必有纜纜相承之中心思想。而吾國以禮為核心之史，則凡英雄宗教物質社會依時代之演變者，一切皆有以禦之，而歸之於人之理性，非苟然為史已也。⁹⁴

所謂人存政舉、人能弘道，此處引文亦把人之理性視為史與禮的樞紐。這裏的理性非常類似由新學轉入舊學的學者梁漱溟（1893-1988）的「理性」概念，是儒學「心知」概念的現代版本，指涉人類感知知識與價值的稟賦。正是人的這種理性，讓人在後代能回溯歷史經驗，重光前代之官禮政教。⁹⁵故次章《史權》就討論了此種稟賦在史學當中的運作。例證是柳氏在周制之外，也非常熟悉的漢代制度：

92 〈從周官觀其時社會〉，《柳集》第 11 冊，頁 297：「《周官》積千百年之經驗而成書，其所禁戒防制者，必皆古代所有之事。」

93 〈《左盒集》跋〉，《柳集》第 8 冊，頁 417。對柳詒徵這一意圖的學術史背景梳理，參沈政威：《國史要義與柳詒徵春秋經史學》，頁 210-250。

94 《國史要義·史原》，《柳集》第 8 冊，頁 10。

95 千春松：《倫理與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國家與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年），頁 245-284。

他族之言權者，每出於對待而相爭；吾國之賦權者，乃出於尚德而互助。此言史權者最宜鄭重辨析者也。歷世賢哲，主持政權，上畏天命，下畏民畀，惟慮言動之有愆，致貽國族以大患。……經典故事咸得其比，則權幸畏之，亦猶民主國家必援據憲法。其限制君權體恤民物，有時且可獨申己意，不為群議所撓。故漢廷之優禮尚書冠冕百僚，良以尚書能為元首處理國事，恒得其宜。⁹⁶

結合前述柳詒徵對民權、民主的看法可知，他眼裏國人理性之運用并不帶來個體相對待的共和格局，而是一種尚德互助、不以個人權利相爭的共和格局。在這種理想化的中國式共和設計當中，歷史以及研治史學的史官對應他族民主國家中的憲法。我們可以推論，柳氏理解的憲法準確來說是他心中的周制、禮制，學史者或者說士人是運用理性、運用史學以實踐這種憲法的人員。由此，士人之代表（這裏的尚書）和元首是這種憲政的核心。但這樣一來，是否回到了秦漢以後的老路，政教體系的維持指望著一兩個人，隨時可能會崩解呢？

在《史權》當中，史之狹義為記事，廣義為官僚系統各分支的書記員。所以該篇之後的《史聯》成為了針對上述缺陷的第一個補丁。當元首、尚書在處理國事的時候，都有聯絡百司百官的義務。惟有放權於下、尊重聯合協同，政教制度的向心力纔能存續。⁹⁷再就書記員的職責推而廣之，百官職位上的士人都需要謹其職守，這也就是《史德》篇的創作意旨。鑒於中國文明在漢後因為君主不得其人而衰敗的問題，這兩個補丁仍然是不夠用的，共和的基礎有待進一步擴大。於是柳氏在《周官》資源之外，再取私家之言為庶民說法：

識生於心，而史為之鑰。積若干年祀之記述，與若干方面之事蹟，乃有聖哲啟示觀察研究及撰著之津塗。……治史之識，非第欲明撰著之義法，尤須積之以求人羣之原則。由歷史而求人羣之原理，近人謂之歷史哲學。吾國古亦無此名，而其推求原理，固已具於

96 《國史要義·史權》，《柳集》第8冊，頁29，44-45。

97 《國史要義·史聯》，《柳集》第8冊，頁82。

經子。……老子之學從此出，故曰「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
孟子之學亦從此出，故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否泰治
亂，消長往復，其跡象有縱橫，其範圍有大小，而賅括史事，馴
至近今，此義尚未能破。蓋人類心靈同此消長，不能有消而無長，
亦不能有長而無消。論進化者，但就長之一面言之耳。⁹⁸

人群之組織，必有一最高之機構，統攝一切，始可以謀大群之福
利，一切禮法，皆從此出。而所謂君者，不過在此最高機構執行
禮法，使之搏一不亂之人。而其臣民非以阿私獨俾此權於一人，
此一人者亦非以居此最高之機構為其私人之利。故孔孟皆曰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苟言民主之真精神，殆莫此言若矣。⁹⁹

或受劉咸炘（1896-1932）著述影響，¹⁰⁰首段來自《史識》的引文構造
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知識論話語，同時處理了柳氏曾多次談到的進化、退化
并存問題。在這一話語之下，個人更多是作為庶人的讀書人而非有官守職
權的史官。通過學習史學，人有能力去認識人群治亂的義理。此種義理，
又指向對大群福利的追求。所以下一段引文的《史義》和之後的《史統》，
都強調了大群福利有賴於一人，而一人執政又必須順應眾人之私的義理。
¹⁰¹順此理路，《史術》把大人通禮治世之術和庶人讀史料成敗之術相提并
論，末尾又頗有深意地先後徵引曾國藩（1811-1872）、顧炎武（1613-1682）
的言論告訴學者：庶人與大人一樣有學問、成德的責任，人人修己則天下
治。¹⁰²如與同期錢穆（1895-1990）、馬一浮（1883-1967）的文字合觀，可
知柳詒徵對民主之真精神的闡發并非孤例。

98 《國史要義·史識》，《柳集》第8冊，頁124。

99 《國史要義·史義》，《柳集》第8冊，頁143。

100 《史識》篇僅提到劉咸炘之《文史通義》評論，但引文以及下文從特殊推理一般、由讀書上提到心知的邏輯，都與劉氏其他著作中所表現的類似，參余一泓：〈論劉咸炘之理事說及其困境〉，《人文中國學報》第33期（2021年12月），頁179-213。

101 《國史要義·史義》，《柳集》第8冊，頁157：「由虞夏而至周，禮法明備，其於地政民政治政綱軍備，洪纖畢具，尤非漢、宋君臣徒托無為者所可比。然漢、宋君臣竊其緒餘猶若可以為治，豈古之政術本天恤民所由來者遠，而所謂集私為公者，固常能節制其私而恒出於公耶？」

102 《國史要義·史術》，《柳集》第8冊，頁209。

《國史要義》終於《史化》。該篇從行孝修身講到大人立教、庶人循教，又從禮教講到各謹官守以利用、記誦經典以傳習文化的意義，將全書的主要觀點冶為一爐。更為獨特的是，該篇始於接引《殷周制度論》的「道德之團體」，終於「多數人民所選擇」：

實則所謂合天下以成一道德之團體之精髓，周制獨隆，而前此必有所因，雖周亡而其精髓依然為後世之所因，不限於有周一代也。以近今而論，祠祭喪服，遠異于周，然其意何嘗不由周而來？猶存什之一二。故千古共同之鵠的，惟此道德之團體。歷代之史，匪帳簿也，臚陳此團體之合此原則與否也；地方誌乘家族譜牒一人傳記，亦匪帳簿也，臚陳此團體中之一部分合此原則與否也。吾謂史出於禮，熟察之，莫非王氏所謂精髓之所寄也…真讀書者，自知盡己及人物之性。昔之教也偏於盡人，今之教也偏於盡物。由《周官》而通之，諷誦必兼六藝，即知格致亦必讀書矣。任何國族之心習皆其歷史所陶鑄，惟所因於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進各循其軌轍，……近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漢唐，漢唐承之周秦。其由簡而繁或由繁而簡者，固由少數聖哲所創垂，要亦經多數人民所選擇。¹⁰³

判斷人事合禮與否是《春秋》之義，無此則史書為帳簿矣。在歷代文化「由簡而繁或由繁而簡」的人事變化中不斷返回禮制的可考源頭，是《周官》之義。《國史要義》未能將柳氏心中的義理完全發揮，尤其是未能考察多數人民所選擇的具體路徑，故一九四七年又有《禮俗史發凡》刊于《學原》。該書篇幅雖不能與《文化史》、《要義》相比，但五臟俱全、未為不備。相比《要義》，該書據《地官·司徒》發明了一點新義：「以俗教安，次於禮儀。其安萬民，則以本俗。故言禮不言俗，未為知禮。」¹⁰⁴由禮而俗，正是前述元首-尚書到多數人民的發展。柳氏既主張士人與執政者尚德互助，亦認為《周官》可以包攝多數群眾之俗：

103 《國史要義·史化》，《柳集》第8冊，頁213，231-232。

104 《禮俗史發凡·論讀經史以治禮俗之法》，《柳集》第11冊，頁317。

禮俗之界，至難劃分。篤舊之士，以《士禮》及《周官》所載，皆先王之大經大法，義蘊闕深，不可以後世風俗相例。究其實，則禮所由起，皆遠古之遺俗。後之聖哲，因襲整齊，從宜從俗，為之節文差等，非由天降地出，或以少數人之私臆，強群眾以從事也。……後世之禮，不必一準古俗。而焚香宰牲，猶緣其意。故推後世平民焚香祀天、割牲禱神之俗，謂自唐虞三代之柴望血祭而來，固無不可，治史而觀其通，則禮俗之演變，古今不隔也。世儒詆斥《周官》，最致疑於《媒氏》、《方相氏》諸文，蓋隆禮而不達俗也。¹⁰⁵

引文中的禮俗演變之史跡，只是一個表面的過程，有待深入分疏。這一過程的起點何在呢？接下來的《秩敘》認為需要從孝行說起。焚香祀天、割牲禱神的民俗能發展為順應節文的官禮，是因為聖哲完成了「移孝作忠」的制度設計。人們在家庭中的孝行乃民俗之大者，故周制「由其天性而節其私，則始自家庭，推至社會國家，始能戢小己之私，而奉身以為公」。¹⁰⁶也可以說，家庭乃是禮下於俗、俗漸於禮的起點與樞紐式場所。在周制失落以後，家庭之教也保存了典範的碎片，這正是後文《教育》篇的看法。¹⁰⁷包括宋明大儒在內的漢後儒者雖然維持了家庭之教，間或如前文所云發展了政黨政治，但距離重光政教典範還差了不少。柳氏指出，漢宋之「儒先行誼，學校箴銘」只是「勵少數人之禮文，不能立大多數之秩敘」，實現上述典範需要一種以兵法部勒群眾秩序的強大執行力。這已然不是稽古讀書可以勝任的了。¹⁰⁸

有趣之處在於，《禮俗史發凡》的下文并未期待有聖人接續道統，以大力淘洗惡俗，而是倒回了前述《國史要義》的結論，再次呼籲各人負起重光周代政教典範的責任。這并非特殊個人的責任，而是國中庶人的責任。有關這一責任，孔曾思孟已有精言：

105 《禮俗史發凡·禮俗之演變》，《柳集》第11冊，頁319-320。

106 《禮俗史發凡·秩敘》，《柳集》第11冊，頁328-332。

107 《禮俗史發凡·教育》，《柳集》第11冊，頁337。

108 《禮俗史發凡·儀法》，《柳集》第11冊，頁343-344。

化成天下，在觀人文。人文之義，頗不易言。古所謂禮之文，惟在義理，……孔子與子路論成人，兼知廉勇藝及禮樂而言。而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者次之。人之分量，若是其難副也，……人人不能盡為天子、諸侯，而人人本其性之善，皆可以行堯舜之道。則人之上達之途，至寬至平，無階級地位、貴賤貧富之別。凡病吾國古禮尚等威、嚴儀式，以為不合於今人平等之精神者，皆由不知《中庸》為說禮之書，必合《周官》與《中庸》讀之，更參以論孟之精義，自可曉然無疑矣。……曾氏謂風俗厚薄，自一二人心之所向。吾人苟不以一二人自詆，奮發其親愛精誠，愛我國家，愛我民族，愛我禮教，愛我良俗，愛我聖哲遺傳豐美之寶典。本秩敘，興教育，定儀法，章人文，因時制宜，折衷至當，不獨可以揚我國光，實可由茲以翊進世運。至誠盡性，與天地參，固非異人任也。¹⁰⁹

本來按第二章《禮俗之演變》的理路下順，柳氏應該據《周官》之義評論漢唐至近世禮、俗分裂，政、教解離的問題，做一種《春秋》式的工作。或許是因為精力不濟，柳氏沒有選擇這條路，只是在此從《四書》的角度對《周官》之教化狀態加以評論，強調人皆可以為堯舜，庶人皆可參贊教化。參贊化育的能力和責任，能解釋成庶人需要順服君臣父子的倫理，就像柳氏戰時演講所說的一般。但是，此處引文的重點，更是「無階級地位、貴賤貧富之別」——「宇宙主義」的實現。

從中體西用、尊孔尊君的時代，到民主共和的時代，再到「愛我國家，愛我民族」的時代，柳詒徵堅持崇古的思想立場，此立場中的宗周、尊孔、尚史、隆孝悌的種種特質鑄成了堅固的思想外郭，抄錄纂集、寓著于述的學風為之柱石。宅此老屋，柳氏吸納新辭彙、調整聲調，以舊學發明新義。崇古之不易和世界之變易，由是維持和諧。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保持這種和諧顯得尤其困難。從五十年代初草成的〈《人民生活史》前言〉中可見，

109 《禮俗史發凡·人文》，《柳集》第11冊，頁344，346，346，349。相關的比較研究，參嚴壽激：〈禮與國史〉，《南洋中華文學與文化學報》，創刊號（2011年11月），頁11-24。

柳氏還希望接著《禮俗史發凡》寫一部應時之作。¹¹⁰結合柳氏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寫與女兒女婿¹¹¹和陳垣（1880-1971）¹¹²的書信來看，他此時面對新潮有著如履薄冰的謹慎。下文將略述學思共通的熊十力（1885-1968）在同期與柳詒徵的交流，¹¹³簡評柳氏崇古學思之歷史處境。

伍、結語：「由舊而新，決不能如我一生遭際」

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上海史學會成立的時刻，柳詒徵小心翼翼地吧尊孔、理性、尚和的理念包裹起來，藏在書面發言之中。¹¹⁴熊十力則不然。鼎革之後數月，熊氏即著手撰寫回應世變的著作與書信多種，¹¹⁵其中包括五一年完稿、嘗試主動影響當局的《論六經》。同年，十力對《國史要義》的讚語被柳氏附入《要義》再版之題辭，他的《論六經》也寄給柳氏閱讀，二人乃有論學長信之往來。從信函中可知，柳詒徵認可熊十力的嘗試：

《周官》曰：「儒以道得民」。此五字極有關係，向來人多忽略讀過去。詒以為自道經危微精一之說至程朱陸王，皆括在此五字之中。公所提均天下之大義，即儒者之大道也。賜書詳示禮樂與中和之功效，精闢之至。詒之管見，妄謂鄉三物之六德與成均之樂德有同有異，其同者即中和與忠和也，此亦人所易於忽略者。妄謂解此可知《中庸》中和位育一節及《大學》格物之學。大本達道，固發明於聖哲，而著力在致字格字。致知格物，是率天下

110 〈《人民生活史》前言〉，《柳集》第8冊，頁455-457。

111 〈與章誠忘、柳定生信〉，《柳集》第12冊，頁171。

112 也可讀作一句無關緊要的調侃，參〈與陳垣書〉，《柳集》第12冊，頁153：「蜀中改土，聞藉高賢，裨贊新政，龍馬精神，聞而健羨。」

113 他們共同的朋友蒙文通雖貶抑《周官》，但學思走向大體類似，參張凱：〈古今分合與「國史」敘述：以柳詒徵、蒙文通為中心〉，《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5期，頁118-128。

114 〈與周谷城書〉，《柳集》第12冊，頁168。

115 參余一泓：〈弘道與護學〉，《鵝湖學志》第62期（2019年6月），頁91-127。

人致之格之。自成均至鄉學，倡此六德之言者非空言也。人人養成中和之心習，推而至於治天地萬物。¹¹⁶

此信九月六日草成，是對前述《禮俗史發凡·人文》內容的發揮，三天后即送抵熊十力處。十力於當日做長信答覆，望柳詒徵「糾舊史之失，而開新史之路」，行《春秋》之事，掃蕩漢後奴儒的家天下史著。¹¹⁷《人民生活史》僅有前言、提綱¹¹⁸撰成，熊氏的期待自未實現。但從引文對「儒以道得民」之疏釋來看，柳詒徵有意地把新社會「均天下之大義」化入《周官》的官禮之制和《四書》的格致之學當中，正如他過去幾十年所做的那樣。只是在新時代的化用要繼續下去的難度也會比在過去更高。宗奉《大易》、《春秋》和《周官》三部寶書的十力後來寫有《原儒》、《乾坤衍》和《體用論（附〈明心篇〉）》三書，兼及「均天下之大義」和「格致以治天地萬物」兩端，代價卻是將「秦以下之窠臼」掃進了歷史的塵埃。¹¹⁹如柳氏能在一九五六年之後繼續述史、存舊於新，完成這樣的調適也并非易事。

柳詒徵、熊十力的友人蒙文通一度認為《周官》是周人殘暴對待被征服者的歷史檔案，也一直認為此書並無垂範後世之效。他們的另一位友人馬一浮在與柳氏交談時，認為以吏為師的主張只會引向思想控制，師法《周官》當師其意，其意無非「政治即是道德，道德外無別有所謂政治」。¹²⁰至於柳、熊的後輩儒者徐復觀（1903-1982）與牟宗三（1909-1995），那就更不客氣了。徐復觀以為《周官》無非王莽私心造作而成，法《周官》以抑兼併、隆教化絕無可能，倒會引向更糟糕的後果。清季《教學通義》、《周禮政要》之類作品亦屬無稽。¹²¹牟宗三徑言尊周公的經制之學不過空

116 〈與熊十力書〉，《柳集》第12冊，頁166。

117 熊十力：〈覆柳詒徵〉，收入劉海濱選編：《熊十力論學書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65-166。

118 〈《人民生活史》研究草目〉，《柳集》第11冊，頁418。

119 「寶書」、「窠臼」出自〈與熊十力書〉，《柳集》第12冊，頁165。1951年8月。

120 蒙文通的態度參前揭張凱文。馬一浮之言分參《劬堂學記》，頁80-81；《復性書院講錄》，收入吳光等編：《馬一浮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14。

121 徐復觀：《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收入徐武軍等編：《徐復觀全集》第11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頁300-305，399。

言事功、嘩眾取寵，與近世以考據為能救世實學的風氣無二。¹²²以上諸儒的負面評論，無不與今人對清季《周官》學的研究遙相呼應，¹²³也折射出了柳詒徵崇古宗周之學的歷史困境：即使在嘗試調和新舊的現代儒者內部，人們面對周制也難以達成共識。因為清季接引東學、直面西學的新學問，在高速發展的二十世紀，還必須進一步地融進現代化——「古」的內涵。於是不可避免地世變恒轉中逐漸脫落。¹²⁴也許正是體味了這些艱難，柳氏自述以百味雜陳的一句話作結：「由舊而新，決不能如我一生遭際」。

12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頁256。上述諸人的疑問反映了現代儒者的特殊心態，他們不認為傳統經制資源能否直接適應現代共和國的政治格局，更對高速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抱有不可知的審慎。正是出於這種心態，馬一浮在1951年作有意味深長的〈寂觀〉，質疑百年來的周官經世潮流，又對將來世運表示不安，參〈寂觀〉，收入《馬一浮全集》第3冊，頁430。

123 參前揭 Rudolf G. Wagner 之“A Classic Paving the Way to Modernity: *The Ritual of Zhou*”。

124 形象地說，像是「滾筒洗衣機甩乾」（離心脫水）。具體地說，是被迫放棄對特定經典、教理的堅守。以熊十力為例，經為常道是他堅持的教理，《周官》是他論政所依經典。兩宋時期出現過《周官》經世之高潮，此後雅好《周官》的管志道、顏元等人，未能掀起大的風勢。十力和近代的諸多學人，或希望在西潮面前重光此經，而終不能逆時而動。在新的時代，唯有儕孔學為世界諸子之一家，讓國史跟上普遍的歷史大潮之發展節奏，中華文明方有翻身、發聲之空間。牟宗三感慨「原始之綜和構造不可復見」，當有感於此。此問題待專文研究，最近可參考的討論見黃冠閔：〈革命經學與哲學改造：論熊十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30卷第1期（2020年3月），頁47-63。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 〔清〕劉光黃
2015 《劉光黃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2015 年）。

近人文獻

- 《晉陽學刊》編輯部編 *Jinyang xuekan bianjibu* (eds.)
1985 《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 第 5 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Zhongguo xiandai shehui kexuejia zhuanlue di wu ji,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 干春松 GAN, Chunsong
2019 《倫理與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國家與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年）。
Lunli yu zhixu: Liang Shuming zhengzhi sixiang Zhong de guojia yu shehui,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9).
- 尤小立 YOU, Xiaoli
2017 〈重讀《評柳詒徵著〈中國文化史〉》〉，《讀書》，2017 年 08 期，頁 133-140。
“Chongdu ‘Ping Liu Yizheng zhu Zhongguo wenhua shi’”, *Reading Books*, Vol. 8. (2017. 08), pp. 133-140.
- 王靜 WANG, Jing
2020 〈黃紹箕與清末學堂教育研究〉，《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 06 期，頁 57-67。
“Huang Shaoji yu Qingmo xuetang jiaoyu yanjiu”, *Journal of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6. (2020. 12), pp. 57-67.
- 牟宗三 MOU, Zongsan
2003 《心體與性體（一）》，《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5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
Xinti yu xingtì yì, *Mou Zongsan xiansheng quanji* Vol. 5 (Taipei: Linking Press Company, 2003).
- 余一泓 YU, Yihong
2019 〈弘道與護學〉，《鵝湖學志》，第 62 期（2019 年 6 月），頁 91-127。
“Hongdao yu huxue”, *Legin-Semi*, Vol. 62. (2019. 06), pp. 91-127.

- 2021 〈論劉咸炘之理事說及其困境〉，《人文中國學報》，第 33 期（2021 年 12 月），頁 179-213。
“Lun Liu Xianxin zhi lishi shuo jiqi kunjing”, *Sino-Humanitas*, Vol. 33. (2021.12), pp. 179-213.
- 佛維 FO, chu
2006 《王國維哲學譯稿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
Wang Guowei zhexue yigao yanjiu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吳宓 WU, Mi
1998 《吳宓日記：1917-1924》（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
Wu Mi riji: 1917-1924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李中平 LI, Zhongping
2015 《前學衡時期的柳詒徵》，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5 年。
Qian xueheng shiqi de Liu Yizheng, Nanjing: Master Thesis of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2015.
- 李孝遷 LI, Xiaoqian
2017 〈印象與真相：柳詒徵史學新論〉，《史林》，2017 年 04 期，頁 120-135。
“Yinxiang yu zhenxiang: Liu Yizheng shixue xinlun”, *Historical Review*, Vo. 4. (2017. 08), pp. 120-135.
- 沈政威 SHEN, Zhengwei
2011 《國史要義與柳詒徵春秋經史學》，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Guoshi yaoyi yu Liu Yizheng Chunqiu jingshi xue, Taoyuan: Master Thesis of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011.
- 岱峻 DAI, Jun
2021 《李濟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年）。
Li Ji zhua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21).
- 承紅磊 CHENG, Honglei
2015 〈從「宗法社會」到「軍國社會」：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嚴譯社會階段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1 期（2015 年 06 月），頁 213-244。
“Cong ‘zongfa shehui’ dao ‘jungguo shehui’: Zhongguo jindai sixiangshi shang de Yan yi shehui jieduan lu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61. (2015.06), pp. 213-244.

- 柳曾符、柳佳編 LIU, Zengfu, LIU, Jia (eds.)
2002 《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Qutang xuej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2002).
- 柳詒徵 LIU, Yizheng
2018 《柳詒徵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Liu Yizheng wenji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8).
- 茅海建 MAO, Haijian
2019 〈戊戌時期康有為「大同三世說」思想的再確認——兼論康有為一派在百日維新前後的政治策略〉，《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01期，頁79-117。
“Wuxu shiqi Kang Youwei ‘datong sanshi shuo’ sixiang de zai queren——jianlun Kang Youwei yipai zai bairi weixin qianhou de zhengzhi celue”, *Social Sciences Frontiers*, Vol. 1. (2019. 01), pp. 79-117.
- 2017 〈再論康有為與進化論〉，《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02期，頁1-69。
“Zailun Kang Youwei yu jinhua lu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tudies*, Vol. 2. (2017. 04), pp. 1-69.
- 2017 〈論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期間的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下）〉，《中國文化》，2017年02期，頁162-213。
“Lun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Wuxu bianfa qijian de zhengzhi sixiang yu zhengce sheji (xia)”, *Chinese Culture*, Vol. 2. (2017. 6), pp. 162-213.
- 孫文閣 SUN, Wenge
2021 《柳詒徵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
Liu Yizheng shixue yanji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21).
- 徐復觀 XU, Fuguan
2014 《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徐復觀全集》第11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Zhou Guan chengli zhi shidai jiqi sixiang xingge, Xu Fuguanquanji Vol. 11.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4).
- 黃冠閔 HUANG, Kuanmin
2020 〈革命經學與哲學改造：論熊十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30卷第1期，頁47-63。
“Geming jingxue yu zhexue gaizao: Lun Xiong Shili”,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Vol.30.1. (2020.3), pp. 47-63.
- 馬一浮 MA, Yifu
2013 《馬一浮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 Ma Yifu quanji* (Hangzhou: Zhejiang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張凱 ZHANG, Kai
2019 〈今古分合與「國史」敘述：以柳詒徵、蒙文通為中心〉，《中國哲學史》，2019年05期，頁118-128。
“Jingu fenhe yu ‘Guoshi’ xushu: yi Liu Yizheng, Meng Wentong wei zhongxi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5. (2019. 10), pp. 118-128.
- 曹天忠 CAO, Tianzhong
2007 〈檔案中所見的部聘教授〉，《學術研究》，2007年01期，頁111-119。
“Dangan zhong suojian de bupin jiaoshou”, *Academic Research*, Vol. 1. (2007.02), pp. 111-119.
- 章太炎 ZHANG, Taiyan
2017 《章太炎全集·書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Zhang Taiyan quanji shuxin j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陳慶年 CHEN, Qingnian
1996 《陳慶年文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
Chen Qingnian wenji (Haikou: Nanhai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 熊十力 XIONG, Shili
2019 《熊十力論學書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Xiong Shili lunxue shuzha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9).
- 蒙文通 MENG, Wentong
2015 《蒙文通全集·史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
Meng Wentong quanji shixue zhenwei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15).
- 趙統 ZHAO, Tong
2015 《南菁書院志》（上海：上海書店，2015年）。
Nanjing shuyuan zh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2015).
- 劉博滔 LIU, Botao
2019 《「舊瓶」裝「新酒」——柳詒徵文化史書寫之兩歧》，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9年。
‘Jiuping’ zhuang ‘xinjiu’——Liu Yizheng wenhua shi shuxie zhi liangqi, Wuhan: Master Thesis of History Department,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2019.
- 劉龍心 LIU, Longxin
2021 《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Zhishi shengchan yu chuanbo: Jindai Zhongguo shixue de zhuanx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蔡尚思 CAI, Shangsi

2001 〈《中國文化史》導讀〉，收入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12。

“*Zhongguo wenhuashi daodu*”, in Liu Yizheng *Zhongguo wenhuash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 pp.1-12.

繆荃孫等 MIU, Quansun (etc.)

2016 《日游彙編 日游筆記 東瀛小識》（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

Riyou huibian, Riyou biji, Dongying xiaozhi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2016).

SCHNEIDER, Axel

2020 “Critiques of Progress: Reflections on Chinese Conservatism”（對進步的各類批判：中國保守主義之省思），in Thomas Fröhlich and Axel Schneider eds., *Chinese visions of progress, 1895 to 1949*（中國進化觀種種：從1895到1949），(Leiden: Brill, 2020), p. 279.

WAGNER, Rudolf G.

2013 “A Classic Paving the Way to Modernity: *The Ritual of Zhou*”（《周禮》：一部鋪平通往現代性之路的經典），in Sarah C. Humphreys and Rudolf G. Wagner edit., *Modernity's Classics*（現代性的經典們），(Berlin-Heidelberg: Springer, 2013), pp. 77-99.